



全民阅读书香文丛



退士副墨

白化文◎著



上海



全民阅读书香文丛

退士副墨

白化文◎著



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退士副墨 / 白化文著. —上海: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,
2017

(全民阅读书香文丛)

ISBN 978-7-5439-7332-9

I. ① 退… II. ① 白… III. ① 书评—中国—现代—选
集 IV. ① G23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035622 号

责任编辑: 胡欣轩 王茗斐

封面设计: 许 菲

丛书名: 全民阅读书香文丛

书 名: 退士副墨

白化文 著

出版发行: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

地 址: 上海市长乐路 746 号

邮政编码: 200040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昆山市亭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 787×1092 1/32

印 张: 7

字 数: 123 000

版 次: 2017 年 3 月第 1 版 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39-7332-9

定 价: 25.00 元

<http://www.sstlp.com>

对我产生巨大影响的四本书（代前言）

苏州图书馆的诸位先进，通过观摩过我的课的老朋友徐雁教授约稿，并赏脸屡次赐寄馆刊，催促提供一篇拙作，以供彻底批判之用。其实，我是“马戏团淘汰的老狗熊，玩不出什么新花样了”。如实汇报，又承指示，命题作文如上。无计奈何，只可一句一句写下来吧。

一

且说，我的幼年在连云港港口一座小山包上度过，距离任何小学都很远。连个小伙伴全找不着。家里只好花大钱，请了一位启蒙老师倪梓铨先生，从1934年开始单独教我，平均每周五六次，一次半天。她是师范学校（中专）毕业，当时不到二十岁，毫无教学实践经验。她用商务印书馆的“复兴小学教科书”的一年

级国语、算术课本为教材。我赋性愚鲁，算术怎么也学不会，“小九九”都背不下来。她只好主要教国语。我倒是爱认字。于是，她就让我突击识字，同时大量阅读课外书，巩固识字成果。这一招有点类似解放初推行的“祁建华速成识字法”。

她让我家给我买了一套上海出版的《故事一百本》，每本大约两三万字，都是摘编，如“生辰纲”“大闹天官”等即是。我就稀里糊涂地看。后来又指定买来必读的“励志书”《苦儿努力记》。

大约两年以后，我已经不满足于看摘编，于是，自学，一方面，从《三国演义》开始，慢慢地能凑合看浅近文言作品，直到更是连蒙带唬看《聊斋志异》；另一方面，看《希腊的神与英雄》等翻译作品。同时，看起报纸、杂志来，订阅《小朋友》杂志，看我祖父订阅的《大公报》《东方杂志》。

我至今以为，在脑子里让古今中外的乱跑野马踩了一大阵，对我的一生起了决定性的良好影响。我养成了爱读书而且见书就想看的习惯。缺点是，外语和理科底子太差，不是不想看，是看不懂。但是，非常爱看科普读物。例如，翻译过来的前苏联科普作家伊林的名作《书的故事》《不夜天》，中国名家贾祖璋先生的《鸟与文学》，都是我百读不厌的。但这样稀里糊涂地“泛读”，需要有大量供应的“书库”。

到1945年前后，在我的初中阶段，我已初步小结出到哪儿去找书看了。一是找同学借，效果差。二是在学校图书馆借，主要借科普著作和商务印书馆的“林译小说”等。校方从借阅册上查不出毛病来，不会影响期终品行评语。三是沟通了北京地安门桥头（俗称“后门桥”）的一个半新不旧的租书铺子，那里出租的书以公案、武侠、剑侠、侦探、通俗言情为主，“小人儿书”忒多。许多小学生坐在铺子里的小板凳上翻看，不带走，租价极廉。我早已跃过看图识字阶段，自然不跟小朋友挤在一起，而是租回家看。租金按天算。我一次借三本，第二天就看完去换，老板特别照顾，比照在铺子里坐板凳看书的价格收钱。用不到三年时间，把那间书铺里的书可说整个儿看过。我养成了快速阅读的能力，半日可以看四五百页，有些故事情节还记得住。为赶着看，躺在床上也看，到中学毕业前左右眼就对不上了，左眼外斜视兼弱视。寄语青年朋友，切勿蹈此覆辙。

书铺老板看我颇有信用，最后，把压箱子底儿的黄色书也都偷偷拿出来了。那些，有的简直不能算书，是十几二十页无头无尾的“摘录”“节选”的黄色“段子”。老北京天桥拉洋片的也偷偷带卖这种“选本”，外带黄色相片。我以为许多中学男生的启蒙性知识是从这里而来。后来，我在北大工作时，有时受北大出版社委托，审查“黄色书”，如《金瓶梅》等，供出版时参考。我

的建议是：一律放行，采取影印方式，限额编号内部发行。但应大大提高售价，愿者上钩。记得八十年代初，北大出版社影印北大馆馆藏崇祯本《金瓶梅》，每部售价六百元，不折不扣。当时，“万元户”一词刚刚出现，我的月工资不过百元上下。出版社念我立功，想卖给我一部。我敬谢不敏。实际上，我看多了，形成一种不知是否正确看法，就是：当时我所见这类明清人小说中的性描写陈陈相因，互相转抄，只不过把人物、场景转换罢了。而且，颇不尊重女性。这一点，比起某些外国，例如南亚次大陆的文学作品之求爱描写之细腻与尊重女性，真有上下床之别。比起《素女经》《大乐赋》等中国古人的描述，也差远了。但是，中国的性描写，总的说有一点可取，即认为女性是有性欲的，淫荡的女人性欲还颇高。欧洲的某些老派学者则认为女性无性欲可言（请参看蔼理士著、潘光旦先生译本《性心理学》），实在缺乏常识或实践。

我还有点认识：那些低级庸俗的黄色书看多了，不一定学坏，倒觉得有如《楞严经》卷八中名言“味同嚼蜡”。我自觉并未变坏，今年八十，从不二色。我的绝大多数中学大学同学均如是。我以为，这与当时的半封建社会大环境与老北京的风气有关。坏书看多了，倒像经常打霍乱或感冒预防针。但是，我绝对赞成禁止此种书，以及禁绝黄色网站等。当代青少年中，没有经风雨

见世面经验的极多，未必经得起此种诱惑也。

小结我到初中阶段为止的读书经验与教训，对比地看，感觉我们的时代真真是飞速进步了。表现为：专为少儿、青少年量身定制的读物比比皆是。特别是自然科学、社会科学的科普读物的质与量飞快上升。读书指导性质的书刊也不断涌现。特别是各个省市级图书馆极为重视，大力提倡，出刊物，办讲座，如风起云涌。当代的后生算是赶上好时代了。

二

本文题目是“对我产生巨大影响的四种书”。实际上，应该是“三种半书”。有一种书，当时我只看了一半。以下，按年代顺序，慢慢汇报。

我在1946年进入北平育英中学高中。当时两位老师的指拨，对我产生了终生影响。一位是多面手王蔚然老师，他在教务处工作，常为学校处理公文。当历史、地理、国文老师缺人时，就来代理。我觉得，他比某些正式讲那几门课的老师讲的好。我总认为他屈才了。他来代课时，劈头就提问：“上高中与上初中有何不同？”然后，慢慢解释：上高中，实际是为上大学作准备。大学有文理法工农医六类学院（国民党政府规定）。各个学院又分科分系。不必企求在中学各科全面发展，只须

将考大学的敲门砖大致磨好就成。应即刻考虑将来入哪种系科，甚至上哪个大学的何种系科。在课余要多读与那种系科相关的书籍，往想上的大学多探探道去。读大学与自己一生的生活道路才是有密切关系的。必须争取在大学里出人头地。这一席话使我茅塞顿开。我经过衡量并与先慈多次研讨，决定读北大中文系。立即偏科，向此方向靠拢。

我家当时住翠花胡同，距离北大红楼仅百米，与北大文科研究所斜对门，我就常去串门。北大校门随便进出，随便旁听。后来，我就听过梁思成、戴望舒等先生的讲座。梁先生的讲座讲了一学期，约有十来次。临近结束时，梁先生说，咱们总得考试一次吧，过过形式，只要交卷，一律及格。不料，堂上一片肃静。一会儿才有人报告，说是旁听的。再询问：“谁是选课的，请举手。”无人举手。梁先生恍然大悟：都是旁听的。系里的正规课程，我旁听过俞平伯先生几节分析宋词（主要是“清真词”）的课，觉得还是看后来出版的《清真词释》言简意赅。从此，逐渐养成不爱听正课却总想坐在老师的客厅里听“神哨”的恶习，至今如此。希望青年人以我为反面教员，切勿蹈此覆辙。还是好好上课罢。

我考高中时的国文试卷颇获育英中学国文科一把手刘曜昕老师赏识，放出话来，说要单独召见（刘老师教高二、高三，一年后才教我）。吓得我屁滚尿流，赶紧连

续造府几次，每次畅谈一个多小时。刘老师觉得我读书过于驳杂，而且品味不高，指导我赶紧去读朱孟实（光潜）先生的《文艺心理学》。立即遵照执行。此书我多年来阅读数十次，脑子里一直模糊一片，什么也没记住。此后，朱先生的主要著作我几乎全读过，有的可说是由深入浅地倒着读，如读《谈美》《给青年的十二封信》，均在读《文艺心理学》之后。约在三年后，再读后来出版的《诗论》。效果均不理想。但是，自觉阅读品味大大提高，并且朝着欧美经典名作和中国古典文献转向。我自觉不是学理论的料，从此也就不再打深入学习任何理论的主意了。无论如何，《文艺心理学》可说是影响我一生的头一种书。它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。

三

北京是文化古都，文化名人聚集之地，学生也随着“开风气”的各种潮流走。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一种潮流是，当时愿意学习中国古代文献的青年人找入门指南，常常阅览梁任公（启超）、胡适之两位大师开的国学入门书单子，还有一位王浣溪女史兼包古今的《中国文学精要书目》。另一种潮流则是顾颉刚、钱玄同等位大师的“疑古”学风。我受此影响，开始怀疑：各位大师学通中外，工作繁忙，自己是否看过书单子中所有的

书，抑或只是翻翻罢了。这时，一位刚从中国大学（现在的教育部即在其旧址）国文系毕业的长辈（我称之为“二舅老爷”）教导说，其实，这些书单子的古代部分大体上源自张之洞的《书目答问》，张之洞在四川任职时所编。他未必亲自动手，此书据说是出于时任他的幕僚的版本目录学大师缪荃孙之手。

1946年7月19日，暑假中，我到西单商场内书摊闲逛，以400元（估计相当于现在20元）买来一本旧书：1936年再版的君中书社铅印本《书目答问》。这个版本稀见。优点是附录材料较多，铅字字体主从大小分明。编者“乐亭李时”字君中，据此书所载李氏序文和广告等透露的消息，李先生著有《国学问题五百》、《国学丛谈》、《君中书牍》（用骈文写成）、《国学书目三种》、《国学常识与技能》、《君中应用文》（分为尺牍、公文、应世杂文三部分）、《活页国文》（后装订成十六册）、《四库全书叙》（即全部“小序”）等，均由“君中书社”出版。西单商场大火以前，此社位于西单商场之内。估计，李时先生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半新半旧的一位学者。他这些著作挺适合那时的北方高中、大学应用的。南方地区可能就销不动啦！抗战胜利后别是一番天地，他这一套更无人过问了。

且说，《书目答问》是我阅读的第一部目录学导读书籍。此书伴我一生，至今时常拿出来翻看。我后来又

有好几种版本的《书目答问》，包括著名的英年早逝的范希曾先辈名作《书目答问补正》，但在日常使用中，总是先抄起李氏此书来看。它挺好使的，它是引导我入门的老朋友啦。

四

我的另一位长辈亲戚，我称之为“四舅老爷”的（二舅老爷的叔伯哥哥）见我爱读书，并且想读经典名著，苦于借不到，就说，可到国立北平图书馆去阅览。那里允许中学生入内。我请他带我去了一次，从此就自己去了。感觉真是个读书的好地方。为了解图书馆，赶紧在书摊上买了一本洪焕椿先生的《怎样利用图书馆》。此书对我了解并学会初步使用大型图书馆颇有帮助。我对它极有感激之情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我如愿进入北大中文系。二年制“图书馆学专修科”附属于中文系。我爱四处看看，有时溜达去旁听几堂课。王重民先生是专修科负责人，名重一时。我去旁听开讲“《汉书艺文志》”，印象是，王先生不会讲课。他讲起来不着边际，没有重点，泛滥无归。“文革”后期，因事常赴王先生府上请教，益发领会王先生学问之大。我体会到：专家未必会讲课。最好有问题当面请教。

1952年院系调整后，跨系旁听成为不可能。图书馆学专修科独立成系。我至今认为，老北大蔡校长真正开门办学的传统从此基本斩断，诚为一大损失。图书馆学教育也稀里糊涂地学习苏联，膨胀成独立王国，恐怕与王重民先生从西欧特别是美国稗贩的一套大相径庭。

我总以为，图书馆学本身的学术与技能技巧，若具备大学学士的水平，再真正学起来，学一年就差不多。所以，美国许多大学开办的是一年制的图书馆从业人员的资格认定班，招来的基本上都是具有某种学士资格的人。北大办专修科，1947—1949年也以招收大学毕业生“回炉”为主。当时办的是二年制，满可以了。后来办系，由三年而四年，本系课程填不满。时至今日，似乎形成政治课、计算机系的专业课、英文外加其他一两种外文课、本系专业课四分天下的局面。解放后，图书馆大发展，容纳了许多各处来的中学甚至小学水平人员，只可不断开设各类在职人员进修班。学员水平参差不齐，梦想借此提职称的人是有的。据我所知，美国失业情况司空见惯，有人纵然是博士、硕士，未必能找得着职业。图书馆馆员职业比较稳定，如果没辙，争取进入这一行当，未始不是求职之道。有回忆录性质的文章介绍说，燕京大学音乐系毕业的一位高才女史，在天津已经自己开班授徒多年，后来随夫赴美。美国像她这样水平的“家教”有的是，而且欺生，她的本行干不成，

只好去大学里一年制的馆员专业进修班学习，最后以馆员终老。

话说回来，我在大学里学的不是图书馆学。专业里的事完全不懂。我的知识限于初读洪先生那本书的粗浅水平，此书也多年束之高阁。好在常去图书馆借书，对“分类”“书号”总算有点认识而已。

大学毕业后，我被分配在北京市教育局系统内，编写课本与教学参考资料，并辅导刚入行的青年教师。机关的购书款颇多，无人采购。有一位姓吴的三十多岁的职员爱读书与逛琉璃厂书店，自愿业余采购。他有时也咨询咨询我。比如，有一年年底，公款花不完，书店店员建议他，买一套线装本《四部丛刊初编》。我知道看的人不会多，可是我想看，就撙节买来，没有书套，散放在库里。吴先生大约从解放初就一直挨整，啧有烦言。鸣放之时，大吐怨气。我那时正在恋爱高潮接近结婚阶段，鸣放会上从不发言，得溜就溜，看电影去了。领导给轰得晕头晕脑，会上短少几个人也就懒得查了。

反右之后紧接着“整改”。我刚结婚，更加自由散漫。一个星期六下午接近下班时，一位中层领导忽然找我个别谈话，说我不积极。叫我马上提整改建议。贼起飞智，我建议把库里的书整理编目上架。这是敷衍他的。没想到，他马上说，下星期一写一份材料来。

我估计，整理几万册乱堆在一起的书，起码得十几

个明白人干几个月的。现在是既没人又没懂行的指挥。于是，回家途中在新开的卖旧书的地安门小书铺转了一下，只买到一本1954年初版的《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图书分类法》。回家闭门读此书和《怎样利用图书馆》。这是倒着往回读呢。也就是说，设想自己就是洪先生，遇见建立一个全新的图书馆的问题，应该办哪些事。

我把事情想多些，想难些，估计领导会知难而退，我也就交差了。想出来的大致是：

找房子成立图书室。起码得一百平方米以上，划分成内外间，内间建大书库，外间为出纳借阅台。专业工作人员至少一人。要为书库打造专门的高大书架，两面放书。要为线装书定制匣式蓝布书套。采购足够的目录柜。

即日起找人编目上架，约需集中十多人于一间大房子中，按现存待编目的书籍计，起码得干三四个月，骑牛半年，骑骆驼一年。找不到内行，也得大专文化水平的人才行。

采购必需用品，如卡片、财产账著录簿、纸、笔、黑墨水、白墨、剪刀、胶水、胶条、标签、袋片等，属于日常的一大笔开销。

必须说明，这些，当时都是我在两晚上加一整天的时间内从洪先生那本书里“倒推”悟出来的。这是我首次认真阅读洪先生的著作。此后，再也没有动过它了。

它成为我的纪念品啦！

上述这个报告，表面上看是实事求是的，但是，我估计是空中楼阁，上哪儿找房子、找人、找钱去。说说罢了。

不料，领导上反复研究，认为可以立即执行。房子腾出来了，十几个大学水平的刚划出的男女右派给派来了，钱，实报实销。任命我主管此事，还任命一位左派非党员当“指导员”。领导指示，那位是看着右派的，不参与业务上的事，也不管我。

我请求给三天假，放我回母校北大图书馆见习，即蒙批准。我在北大馆参观了文科开架书库，翻阅了解放后出版的高校图书馆学教材，这才看到刘国钧先生和陈绍业、王凤翥两位老学长（二位是1947年建科首届“回炉”式最老最老的学长）所著《图书馆目录》（1957年第一版），如获至宝。回城后立即先到东安市场书摊上找，好不容易觅得一本散出的旧书，捧回家，结合在北大馆见习所得，没日没夜地边读边思索。

我立即付诸实践，变通的做法是：

架号，即索书号，包括分类号，著者号，版本、稽核、附注等项，以及图书馆业务注记等，大体上按刘先生此书处理。变动最大的是分类。因为，要编目的书籍报刊，教育类的较多，其他文科书籍不少。理工农医等书不多，高精尖的如《堆累素数论》、《工程控制论》（此

书当时似尚未还译为中文)简直没有。教科书及其附属的参考资料不少。于是,决定不按常规,打破严格的经典性质的学科顺序,按照毛主席指示:“看菜吃饭,量体裁衣,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”。另起炉灶。但只在大类上做文章。不使用当时盛行的在大类上突破十进制的做法。当然,首先突出政治,立“1”为“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”,“2”就得是“哲学”了。“3”则提升“教育”为大类,将教科书之类完全纳入,各学科的教科书系统作“互见片”。“0”号则将工具书、丛书图书馆学系统之类纳入,是为“总类”。理工农医等书统归“9”字号“科学”。“4~8”是怎么分的,我忘了。大约“4”是“政治”,“5”是“经济”。“6”是“历史”,“7”是“地理”,“8”是“文学”。分类号完全采用阿拉伯数字“四字编码”,其中“2~4”字完全照抄“人大分类法”。不过类号有升有降而已。这样,我就省事了。有问题还可往它身上推。能有什么问题呢?我考虑到,政治变动是经常的,要留后手。

图书分类,应该是科学的分类。可它往往为政治和国家组织所左右,更受历史上原有的分类法的制约(如“四部分类法”困扰我国新分类法至今),这一点在中国汉籍方面表现得十分清楚。解放前数十年,我国所有的数十种依托国外分类法并略加改造的“新式”分类法,虽然各有偏重,但基本上均向着当时的“科学分类”靠